

逯耀东 著



# 从平城到洛阳

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从平城到洛阳

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

逯耀东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逯耀东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101-05183-9

I. 从… II. 逯… III. 中国-古代史-南北朝时代 IV. K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6845 号

---

**书 名** 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  
**著 者** 逯耀东  
**责任编辑** 樊玉兰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19½ 插页 2 字数 264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183-9/K·2301  
**定 价** 36.00 元

---



**逯耀东** (1932-2005) 江苏丰县人。台湾大学

历史系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首届博士班，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四十餘年，范围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现代史学、中国饮食文化史。擅长历史随笔、文化散文的写作，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历年所撰史学论集、散文集二十餘种。



责任编辑·樊玉兰

封面设计·毛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從平城到洛陽

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

台靜農先生題簽



## 出版说明

逯耀东先生 1932 年生于江苏丰县，后随家迁往台湾。1953 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在劳榦先生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北魏与西域的关系》，初窥魏晋南北朝史门径。1961 年考入香港新亚研究所，得亲聆钱穆、牟润孙、严耕望先生等诸史学大家的教言，由牟润孙先生指导，完成硕士论文《拓跋氏与中原士族的婚姻关系》，毕业后留任助理研究员，继续研究拓跋氏与中原文化的接触与转变，其成果后结集为《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1968 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班，得亲近沈刚伯、李宗侗、姚从吾诸先生，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为研究范围，论文由三位先生亲自指导。其间曾先后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平冈武夫研究室，再赴香港新亚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完成博士论文《魏晋史学的特色——以杂传为范围所作的分析》，获台大历史系首届文学博士学位，遂受聘任教于台大历史系、辅仁大学历史系。1977 年，受香港中文大学之聘，入新亚书院历史系任教，时牟润孙、严耕望先生甫退休，逯先生继任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及“中古史料”等课程，执教新亚十四年之久。1991 年，辞聘香江，重返台大历史系，讲授“中国大陆史学”、“传统史学序论”及“中国饮食史”等课程，直至 1998 年夏退休。

逯耀东先生的研究范围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现代史学、饮食文化史，擅长历史随笔、文化散文的写作，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历年所撰史学论集、散文集二十余种。近年，逯先生将其新旧史学论稿与文稿分别辑为《糊涂斋史学论稿》、《糊涂斋文稿》，由东大

图书公司陆续在台北出版,其中史学论稿已出版《魏晋史学及其他》、《胡适与当代史学家》、《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四种,文稿已出版《窗外有棵相思》、《出门访古早》、《那年初一》、《似是闲云》、《肚大能容——中国饮食文化散记》五种。此外,《肚大能容——中国饮食文化散记》、《寒夜客来——中国饮食文化散记之二》由北京三联书店分别于2002年、2005年出版,以其文采粲然、脍炙人口而深受大陆读者的喜爱。

《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二书是逯先生魏晋史学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代表作,广为学界所知。《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以拓跋魏进入长城建立的首都平城及孝文帝迁都后的洛阳为基点,讨论拓跋魏进入长城后近一个世纪文化变迁的历程,对两种异质文化交融所形成的“文化边际”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魏晋处于汉唐之间,是一个解构与重组的时代,儒家思想失去其原有的权威地位,经学笼罩下的学术纷纷脱离经学的羁绊而走向独立。《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着重考察这一时期史学主流之外出现的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流变,探讨这些新史学写作形式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

二书均经过作者前后三十年的不断修改和重写,见解精辟,体系自成。现经逯耀东先生生前同意、东大图书公司授权,由我局出版简体字版。编辑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核对了原书中的引文,对征引疏漏及排校错误作了适当订补和修正。遗憾的是,二书简体字版未及问世,逯耀东先生已于今年二月因病遽然逝世,他计划撰写的新版前言也未能完成。在此我们谨简述逯先生的学术历程及主要著述,供读者参考。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6年9月





## 序

当我还是个历史学徒的时候,有个问题常萦胸际,那就是两种不同类型文化接触时,最初往往会出现一个文化的边际。这个文化的边际,对文化接触后的冲突、调和与融合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虽然这只是少年狂狷之念,但等后来接触实际的资料,进行真正的研究时,仍然会隐隐浮现。从最初讨论汉匈之间的瓯脱,经过拓跋魏文化变迁的历程,到最后对长城的探索,或多或少都有这种观念痕迹。

不过,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与讨论,往往都浅尝即止。只有这本书讨论的拓跋氏部族进入长城后的文化变迁,比较具体。讨论的范围从太祖拓跋珪天兴三年(408),选择平城建都,到高祖拓跋宏太和十七年(493),为了迁都而规建洛阳,前后经历近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是拓跋魏文化转变的重要时期。由最初胡汉杂糅的文化形态转变开始,最后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融于汉文化之中。讨论和探索就环绕着这个主题进行,研究拓跋魏和汉文化直接接触过程中,在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不同的问题。不过,最后仍然无法得到肯定的结论。因为无法确定对拓跋部族本身文化而言,这种变迁的结果是圆满或是悲剧性的。

这些问题是香港新亚研究所五年读书与工作,与后来回到台湾大

学历史系任教最初几年相继完成的。当年的新亚研究所确是魏晋研究的理想的环境，我的业师牟润孙先生是治魏晋的，同时又有钱宾四先生与严耕望先生从旁引导督促，使我顺利进入这个研究领域。这本书记载的是我在这个领域里蹒跚学步，到独立行走的历程。

那年，周一良先生再访美国，到普林斯顿大学，黄清连弟正在那里写论文，他向周一良先生请教台湾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情形，周先生竟提到了这本书，并有所称赞。周先生是前辈学者又是这个领域的大家，既蒙青睐，欣喜何似！此后这些年向他多所请益，眷顾尤多。只是我已转变了研究的方向，虽仍在魏晋领域，但已和过去研究的范围完全不相涉，人生的际遇真是难意料。

犹忆当年准备赴香江就学，临行请教鲁实先先生。鲁先生是我就读嘉义中学时的国文老师，此后这些年一直维持亲密的师弟关系，他常以我未能传他的历法与甲骨绝学为憾，他劝我此去能续王昶旧业，作《金石三编》。自知无此能力，不过入学以后，还是细读赵万里的墓志集释，及其他拓片，没有想到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帮助，这真是无心插柳了。

这本书最初由联经出版，现在，得其慨允而纳入《糊涂斋史学论稿》，列为一编。当初这本书出版，请台静农先生题额，如今台先生已归道山，为了表示对台先生诚挚的谢意，仍以他的题字作封面。最初由黄清连对全书清理，这次还是麻烦他，不过书中的引文，则由李广健弟查校，其中仍难免有误。这本书基本上没有更删，仅增《〈崔氏食经〉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一文，这是参加第一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也是这么多年惟一一篇这个领域的论文，可作为“崔浩之狱”的一个旁证。

西元 2000 年 10 月 22 日序于台北糊涂斋



## 目 录

序	/1
导 言	/1
北魏前期的文化与政治形态	/25
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	/71
《崔氏食经》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96
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	/129
北魏平城对洛阳规建的影响	/160
拓跋氏与中原土族的婚姻关系	/181
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	/256
附录 试释论汉匈间之瓠脱	/290



## 导 言

讨论近代中国以前的历史,无可否认地,边疆民族与汉民族以长城为基线所发生的冲突与调和,对彼此历史形成的激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尤其边疆民族进入长城之内后,在中国建立统治政权,与广大的汉族人民,基础深厚的汉文化直接接触,促使其自身文化发生转变,经过不同阶段的冲突与调整,最后融合为一。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却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边疆民族徘徊在长城之外,对汉民族的边疆,进行不定期而且不断的掠夺或攻击时,则将这两个民族以长城为界限对立起来,认为“非吾族类,其心必异”<sup>①</sup>。并以为边疆民族进入长城之后,必然通过“用

---

<sup>①</sup> 王船山《读通鉴论》(台北:广文书局,1967,影印本)卷十四“东晋哀帝”:  
“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是这种论点最高度的发挥。

夏变夷”的阶段,最后达到“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境界<sup>①</sup>。这种以长城为基点,汉文化为本位的论点交互应用所作的解释,固然突出了汉文化的优越性,与在文化接触时所表现的弹性与兼容性<sup>②</sup>,但却将两种不同类型文化接触与融合的过程单纯化了<sup>③</sup>。这种感情性的

① 夷夏对立的问题,一向是传统中国史家注意的问题,争论也极多。一般说来,传统中国史家多从“文化”上的区别,来评断夷夏的对立与否,并从文化上来贬抑夷狄。这种论点当自殷周之后才形成,并在孔子及其后的儒家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等,就是从“文化”的观点来区分夷夏。夷夏对立观点确立之后,则“用夏变夷”以及“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就很自然地成为儒家的理想,譬如:韩愈《原道》所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从这里多少可以窥见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夷夏问题所持的态度。

② 姚从吾师对于中国文化的兼容性,有独到的发挥,见《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原载《大陆杂志》十五卷六期(1957),后收入《东北史论丛》(台北:正中书局,1959)上册。

③ 两种不同类型文化接触与融合的过程,人类学家有繁多的理论。即以现代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外学者而言,其理论也极复杂,并不像传统史家的单纯化解释。譬如:姚从吾师认为:中华民族与文化的形成,经过“五大酝酿、四大混合”,边疆民族文化和中原儒教大同文化接触后,虽然经过大同的阶段,但最后两者都融合为一了。参见注②。陶晋生兄在研究华北女真汉化后,认为:自金朝建立后,女真人就逐步汉化,因而引起内部危机,包括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本土化运动等,最后终因各种因素的配合,而达到较为彻底的汉化。事实上,女真汉化的过程,可以由“涵化”(acculturation)的理论,来解释其中部分现象。参看黄清连《评介陶晋生教授著〈十二世纪华北女真汉化研究〉》,《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十卷七期(1977)。西方学者们的解释,也相当复杂,如:社会史家艾伯华(W. Eberhard)采取一部分传统中国的全部汉化说,并认为外来征服者与汉族人民有相互的影响。维特佛格尔(K. A. Wittfogel)认为汉族并不能完全吸收入侵的外族,辽、金、元、清都没有被中国同化。赖德懋(O. Lattimore)认为游牧和半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处于对立的地位,谁也不能同化谁。费正清(J. K. Fairbank)与赖世和(E. O. Reischauer)认为华夷有共同治理中国的经验,其制度通常是二元的,他们部分同意边疆民族最后要走向汉化。以上西方学者的解释,参看陶晋生《历史上汉族与边疆民族关系的几种解释》,《边疆史研究集——宋金时期》(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



解释,即使在近代与西方文化接触后,仍然发生支配性的影响,使中国在和近代西方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产生许多不必要的挫折<sup>①</sup>。

事实上,即使那些进入长城的边疆民族,最后放弃自己原来享有的文化传统,完全融合于汉文化之中,其历程也往往是非常转折与艰辛的。因为文化接触与融合的因素非常复杂,往往在接触与融合的过程中,一旦遭遇挫折与阻碍,必须经过不断地再学习、再适应、再调整之后才能完成。而且不论融合或被融合的双方,都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被融合的民族完全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但仍然有某些文化的因子,无法完全被融合而残留下来。这些残留下的文化因子往往在被吸取后,经过转变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成分;不仅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也增强了汉文化的活动力量。中国历史自魏晋以后,由于边疆民族不断涌入长城,结束了汉民族在长城之内单独活动的时期,汉民族不断和不同的边疆民族进行接触与融合,使汉文化增添更多的新内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更多彩多姿。

拓跋氏部族进入长城后的文化转变,就是上述理论的一个最好例证;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永嘉风暴中,拓跋氏部族最后进入长城,不仅收拾了黄河流域的残局,也总结了自秦汉以来,汉民族与边疆民族以长城为基线的冲突与斗争,同时对东汉以来渗入长城的其他边疆民族作了一次融合,然后以此为基础,和汉民族作一次彻底的融合。经过这次融合以后,新的血轮注入汉民族之中,新的文化因子也开始在汉文化中孕育。后来,这些新血轮与新文化因子,又转变成支持隋唐帝国建国的基础。

从太祖拓跋珪天赐三年(406),创建平城作为北魏前期的首都,到高祖拓跋宏太和十七年(493),为了准备迁都而规建洛阳,前后经过将

---

<sup>①</sup> 参看拙作《城里城外——谈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知识分子》,《魏晋史学及其他》(台北:东大,1998)。



近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是拓跋魏文化转变的重要时期，由最初胡汉杂糅的文化形态，转变到最后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融于汉文化之中，是本书讨论与探索的范围，其中包括《北魏前期的文化与政治形态》、《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北魏平城对洛阳规建的影响》、《拓跋氏与中原士族的婚姻关系》、《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都环绕着这个论题，研究拓跋魏与汉文化直接接触后，在不同的转变阶段，所产生的不同的问题与影响。

原居于嫩江东北、额尔古纳河东南地区的拓跋氏部族，最初虽然有了原始的农业生产经验<sup>①</sup>。但正式由游牧转向农业生产，却是徘徊在长城之外的西元 105 年的后期。当时他们的游牧区渐渐越出河套地区，游牧的范围西到五原，东到幽州的代郡和上谷附近。这一带正是汉武帝击败匈奴后，极力经营的地区。汉武帝曾在这里筑坞堡，开郡县，移民实边。虽然当时只为了消极的占领，将长城的防线延伸到草原与农业的过渡地带，却意外地将农业文化的种子，播散到草原文化地区的边疆，在那里形成许多分散的小农业社会单位，对后来草原和农业文化的接触和融合，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sup>②</sup>。

作为草原与农业文化分界线的长城，由于汉高祖七年（前 200）平城之役失败，退缩为防止边疆民族入侵的防线。此后维持长城防线的安宁，成为每个时代对外的主要策略。如果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超越

① 河地重造《北魏王朝の成立とその性格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十二卷五号（1953）。认为拓跋氏部族最初已有农业生产，但这种农业生产是微不足道的。

② 拙作《勒马长城》，《魏晋史学及其他》。



草原民族,并且深入沙漠,便会在长城外农业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建立许多防卫性的屯垦区,成为小农业社会单位,以拱卫长城防线。不过,一旦农业民族的力量又退回长城,无法控制这些边缘地区的防卫据点,草原民族的势力就立即进驻这个地区。

这些分散在长城外的小农业社会单位,在农业民族的力量撤退以后,便斩断和长城内母体社会的文化脐带关系而独立发展。因为地处于农业和草原的过渡地带,很快就形成半农半牧的社会经济形态。草原民族进驻这个地区后,渐渐放弃一部分游牧,采取某种程度的农耕。在那里且牧且耕,等待机会向长城之内渗透。当农业社会民族的力量退缩,而且长城之内的政治或社会情况又在动荡的时候,停留在这个地区的草原民族,便乘机翻越长城,在长城之内建立统治的政权。于是另一个草原民族又迅速递补,进驻这个地区,在那里等待机会进入长城。

那些进入长城的边疆民族,不仅建立政权,而且开始修补长城,更进一步代替农业民族执干戈以卫长城,阻止另一批草原民族入侵,并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而渐渐汉化了。至于汉化程度的深浅与缓速,恰和他们居住这个地区时间的久暂成正比。这是讨论自汉以后,满清入关以前,草原与农业文化接触与转变,可探索的轨迹。本书附录《试释论汉匈间之瓯脱》,即探讨这个地区建立的经过,及草原民族进驻这个地区后,文化与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

拓跋氏部族也曾在这个地区居停,而且居停了较久的时间,《北魏前期的文化与政治形态》即讨论拓跋氏部族在这个地区文化转变的过程,及其进入长城建立国家后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不过,拓跋氏部族进驻这个地区之初,游牧经济仍然是主导的力量。因为游牧经济不仅是他们的主要生活资料,也是他们对外扩张的战斗力量。但是当拓跋氏部族积极发展畜牧事业的时候,已经开始经营农业了,除了这个

地区原有的农业基础影响外，拓跋氏部族经营农业最现实的原因，还是由于不断向外扩张。由于他们不仅获得大量的牲畜，并且劫掠了众多的人口，再加上许多归附部落，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不足以维持所统治人民的生活，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

不过，最初拓跋氏部族的游牧民，并没有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工作是由原居住在这个过渡地区的“乌桓杂人”及“雁门”晋人负责。他们原先就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为拓跋氏部族的统治，改变原来的生产方式。后来由于拓跋猗卢协助刘琨，从而获得雁门陉北五县之地，刘琨将原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民迁走。于是拓跋猗卢立即迁徙原来他统治下从事农业生产的“乌桓杂人”与“雁门人”，填补这个真空地区，利用原有的农业生产基础，有计划地从事农业生产。至于拓跋氏部族的部民参加农业生产，却是在什翼犍被苻坚所灭，拓跋氏部族瓦解以后，苻坚分散其部落于“汉障故地”，强迫原来的拓跋氏部族的游牧民定居下来，并且遣派官员监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这对加速拓跋氏部族的游牧经济形态转向农业经济，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和影响。后来太祖拓跋珪登国九年(394)拓跋仪在五原至柘杨塞一带的屯田，便利用这个基础继续发展，并获得丰硕的成果。这次屯田的成功增强了拓跋氏部族发展农业生产的信心。因此，在这次屯田的后三年，拓跋珪便从他控制的地区，迁徙“山东六州”民吏三十六万口，到首都平城的京畿地区<sup>①</sup>。这批徙民到达之后，立即计口授田，并配给耕牛，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生产。过去，拓跋氏部族只利用过渡地区的农业基础，从事有限度的农业生产，这次却是由中原地区真正的农民，直接担负起农业生产的工作。

农业生产虽然扩大了，但拓跋氏部族的游牧经济的畜牧事业，并

---

<sup>①</sup> 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认为“六州”是指后燕故地。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7)。